

寿生文集

北平“拉丁区”
的年青佳客

行 程 定 义 习 俗 考 究
拾 遗 补 正 小 考 一
山 气 之 多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54年12月
胡家巷
12月

12月
12月
12月

老軍「拉丁區」的陣青世孫

費州文庫



· 0423713

北平“拉丁区”的年轻佳客

——寿生文集

主 编：申远初 申爱初 申元初

资料整理：喻莉娟 申元初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寿生文集:北平“拉丁区”的年轻住客/申远初,申爱初,
申元初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6

ISBN 7-221-07427-5

I. 寿... II. ①申...②申...③申... III. ①寿生
—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编 CIP 数据字(2006)第 062748 号

寿 生 文 集

编 者	申远初 申爱初 申元初
责 编	朱 江
装帧设计	徐学廉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2)
印 刷	贵阳佳美印务公司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960mm
印 张	16 印张
书 号	ISBN 7-221-07427-5/I. 1502
定 价	36.00 元



20 世纪 30 年代的寿生

寿生图升平 05 第 10 卷

图中在玫瑰园101号拍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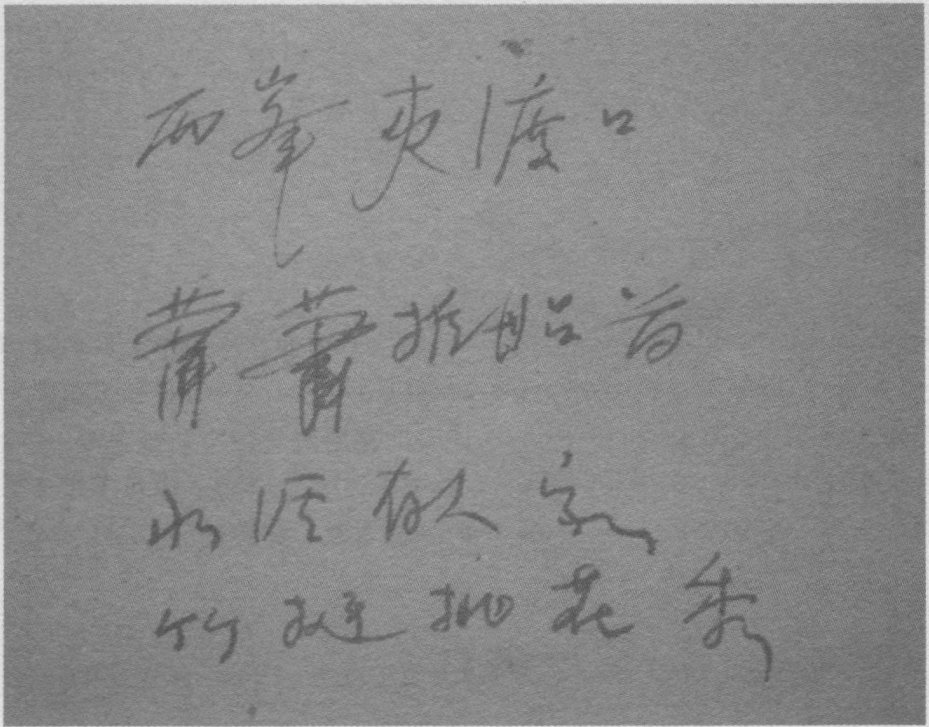
照片为北京“东厂”的牛福信先生所摄，非常珍贵。

此照片为北京“东厂”牛福信先生所摄。



20 世纪 30 年代的寿生

目 录



寿生手迹之一

两峰夹渡口，萧萧推船首。
水涯有人家，竹挺桃花秀。

序

弥补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遗珠之憾

刘扬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撰著成果累累,但也不无遗珠之憾。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经活跃于北京文坛的贵州作家寿生的长期被遗忘,被从文学史书写中漏掉,便是显著的一例。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新文学创作的中心,曾经聚集过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并为这些如日初升的精英人物提供了崭露头角的宽广舞台。1934年,一颗闪亮的文学新星在北京的文坛上陡然升起——来自贵州省务川县的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学生寿生(真名申尚贤),一鸣惊人,在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主办的政治新闻评论周刊《独立评论》上,一年之内陆续发表了六篇时评和六篇小说。胡适十分欣赏这位“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的高明见识和非凡才气,不但在发表他的文章和小说时常常亲手写“编辑后记”加以揄扬和宣传,而且还写信将他的小说《新秀才》作为“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典范文字介绍给其他文学青年学习。于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寿生一时间声名鹊起,成了在《独立评论》上可以和前辈文化名人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等平起平坐地商讨问题、辩论问题和发表新作的经常撰稿人。

自古及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要能脱颖而出,除了本人优良的资质条件之外,还要有机遇,还要有慧眼识才的前辈大师的奖掖和扶持。寿生,正是在“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五四新文学运动领袖胡适的无私帮助下(当时胡适为北大教授,而寿生仅为北大的一位“偷听生”)步入文坛并迅速成名的。此后一段时间,寿生在时评写作和小说创作上一发而不可收。在从1934年到1936年短短的三年中,他在《独立评论》上共发表了十二篇时评,十二篇小说(这些作品全部都收集到本书里了);同时间还在《大公报》、天津《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品。寿



风谣学会的一帧宝贵留影

1936年2月，顾颉刚发起筹备“风谣学会”，6月16日在北京大学文学院举行成立会议。顾颉刚、方纪生、容肇祖、沈从文、申寿生、常惠、胡适、吴世昌、李素英、章廷谦、罗常培、周天、钱玄同、朱光潜、徐芳出席，周作人、魏建功因事未到。其时，加入该会的还有广州、杭州、厦门、苏州、上海、南京以及日本各地的同好，共30余名会员。该组织先后在南京的《中央日报》和北京的《民声报》、《晨报》上创办了《民风周刊》、《民俗周刊》、《游俗周刊》，为我国民俗学运动做出了贡献。

照片为风谣学会一次活动的留影。前排左起第3人徐芳、第4人李素英（此二人为复刊后《歌谣周刊》

的主编）、第5人顾颉刚、第6人胡适；第二排，徐芳、李素英之间为罗常培，顾颉刚、胡适之间为吴世昌；第三排第1人为杨翌，胡适右后为方纪生；第四排，方纪生右后为容肇祖。（王文宇）

青海土

生活在青海省互助县的土族人民有着独特的丧葬习俗，除了为夭折的儿童夭葬外，一般都实行火葬。

灵轿是土族火葬必备的葬具，它的样式像一座小小的楼阁，里面能够躺下一人，木制的灵轿上精心地雕刻着人物和花卉的图案，轿顶则装饰着日月形饰物。

风谣学会成立(发表于《民俗》画刊1989年8期)

生在北京期间的文学和文化学术活动是多方面的，除了从事小说创作和时评之外，他还于1936年在北京大学参加了由顾颉刚发起、由胡适任主席的“风谣学会”。在这个学会里与寿生平起平坐的会员如容肇祖、沈从文、吴世昌、罗常培、钱玄同、朱光潜、周作人、魏建功等人，都是全国第一流的文学家或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作为“风谣学会”的会员，寿生曾多次在该会会刊《歌谣周刊》上发表研究文章和他所搜集记录的贵州民间故事、歌谣、山歌。这些文章和作品，也都全部收集到本书里了。

根据以上介绍的情况可以推测：如果不是因为1936年以后国内社会政治形势和作家本人生活道路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在北京期间发展势头就如此强劲的寿生，多半会在小说、散文创作和民间歌谣搜集、整理与研究这两块土地上继续耕耘，成为成就更为卓著的作家兼诗歌研究专家。不幸的是，1937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寿生被迫南下回乡。回到贵州之后改从他业，走上了另外一条生活道路。从那时起直到1996年逝世，整整六十年的时间他再也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文学作品。寿生从文坛消失了。寿生的名字和他的曾经惊动一时的文学业绩甚至被人们淡忘了！我本人在几年前承乏担任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文学史》一书的主编，在检核资料时得知，新中国建国以来海内外出版的许多或详或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竟然没有一部提到过寿生。这种遗漏对于作家本人是极不公平的！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一项缺失。

对于寿生为什么会从文坛消失和为什么他不被建国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所书写,他的家属和贵州文学界的朋友们都认为是一个“谜”。我想,勘破这个“谜”是一个可以留待现代文学家们去从容探讨的问题。作为寿生先生的贵州老乡和后辈,我认为更要紧的事情是搜集、整理和编辑他的作品,出版他的文集,为将他书写到中国现代文学史里提供依据。所幸的是,经过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这件事情终于做成了——这就是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寿生文集》。在这件事情上我曾尽绵薄之力,愿就我所知回忆和说明如下:

编辑出版《寿生文集》的工作启动于1996年。那一年的春天,寿生先生以八十八岁的高龄病逝于遵义,他的长子、时任贵州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的申远初教授奉派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远初兄是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贵州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同学(他高我两个年级)，“文革”初毕业分配后天各一方。三十年后在京城重逢,其乐可知。第一次见面时,远初兄就告诉我他老父去世的消息,并向我讲述了老人晚年给晚辈们交待的一个任务:搜集他三十年代在北京发表的作品。远初兄认为,我是专职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对历史资料和首都各大图书馆藏书情况比较熟悉,要求我帮助他完成老先生的临终嘱托。当时我深感义不容辞,遂慨然应老同学之命——实际上是应寿生老先生之命,开始了帮助搜集整理其作品的工作。记得那一年的四、五月间,我除了连续几天坐在我院图书馆查阅、复印有关书籍和刊物外,还开了单位介绍信,与远初兄并肩出入于北京的好几家图



寿生 60 年代全家照

书馆,根据老人口述提供的线索,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有关的资料。经过这一番努力,寿生作品集已经骨干大备;再加上他回乡后创作的那些未曾公开发表的诗词,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寿生文集》了。需要略作说明的是,我和远初兄所搜集的寿生北京期间的作品,可能还会有个别的遗漏。例如:老人家曾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作品,可是我们查遍了那几年的《大公报》,竟然一无所得。不知是因为我们眼花放过了,还是因为年代久远了老人偶然误记?好在除了这一例之外,其他报刊所登载的作品都已悉数收集到,可以下结论说,这个集子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寿生创作的全貌了。

《寿生文集》编成之后,曾于2000年底由务川县政协筹资内部印行。最近远初兄来电告知:《寿生文集》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并约我这个当初的知情者和参与者为此书写一篇序。我接到电话后和远初兄一样感到无比高兴,就写下了上面的一些话。寿生先生不但属于贵州,也属于全中国。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不但大大有助于开发乡邦文化资源,为贵州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增添新东西,而且也将弥补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一处缺憾,使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体系更加完整丰硕。

2006年4月9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序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我懂得了珍惜

申远初

在这本文集出版之际，我更加怀念父亲寿生（我们叫他么爹）。我很后悔，没有在他在世之时，去收集复印他几十年前在北京发表的那么多作品。

记得小时候在寂静的夜晚，我常常睡在床上，听见父亲和母亲谈论父亲曾经写过或者正在酝酿的剧本、小说，好像有《史夫人》、《蝴蝶城》、《天桥》……那时我似懂非懂，却尖着耳朵听下去，只觉得好玩，神秘，伴随着火盆上水壶的滋滋声，朦朦胧胧中有一种美的享受：泉水淙淙，溪流清清，绿柳垂杨，河边石板上女人们阵阵的捶衣声……几抱大的青球树、皂角树、枫香树、白果树、楠木树……万寿宫、禹王宫、城皇庙、书院、文昌阁、川会馆、申忠节公祠（申家祠堂）、天主堂……南门外进城的长长的石梯道上一座座的大牌坊、窄而又长的香巷子尽头那高耸的镏金绘彩的木牌坊、东门外庆余桥边雅致的东升塔……庭院深深的伍家院子、李家院子、龚家院子、申家院子、刘家院子、铁家院子、田家院子……连接那些院子的曲折的一条条巷子……车家岩、伍家岩、菠萝山那些山顶危崖上的营盘堡垒……我就这样地多少了解了古老的务川县城都濡镇过去的风貌。后来，我读到了黄庭坚的《阮郎归》词：“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犀胯斗圆方，研膏入焙香。青箬裹，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又知道早在宋朝时，已有大诗人欣赏都濡的“春味”了。我还模模糊糊地知道了旧时的北京……胡同里的叫卖声多么悠扬婉转，中南海的庭院如何的多，沙滩北河沿一带如何的吸引人，有钱人家夏天用的冰是怎样由苦力们在冬天封冻的湖上，淌着汗水，光着上身，吆喝着号子，整块整块地凿下来的……听着听着，我就这样渐渐地入睡了。那些发生在古都、古镇的故事，具体情节我已记不清了，但母亲的两句话我至今还记得，“知道过去北京的不多了，你是一个……可惜。”“知道务川和黔北过去的，算你寿老么了……可惜。”可惜什么？我当时不懂，要是懂的话，我会舍得睡去吗？我很后悔。

“老鸦飞过黑树桩，阳雀看见哭一场，虽然不是同类鸟，同个坭枝歌过



寿生与妻子熊南英 20 世纪 40 年代合影于遵义

凉。老鸦飞过黑树林，喜鹊看见哭几声，虽然不是同类鸟，同个坭枝歇过荫。”“碗豆角胡豆角，扬州回来钿角角。会吃烟(大烟)会打牌(麻将)，这个事情划不来。”在写这篇文章时，这两首民谣突然浮现在我的脑际，这是父亲在家里经常哼吟务川的民谣时，我不经意间记得的。父亲酷爱家乡务川的民歌，记得有一次他和母亲正谈论着山歌，突然间他站起来大声地唱：“风——吹过那菠萝山——雨打下那俯鸡关——风风哩那雨雨嘛——你看5月——秧子嘛绿幽呀幽哟——”，他唱的是他加工过的山歌调，唱时昂着头，有节奏地舞着手，我觉得又好听又稀奇。菠萝山和俯鸡关是县城都濡镇的两个地名，这我是知道的，不过我当时不愿他这么大声地唱，生怕外面的人听到了奇怪，还暗自埋怨过呢。现在想来，我应该多听他唱，赖着要他唱才是，我真后悔。

6

记得我考进贵州大学中文系后，父亲多次对我说，你应该好好地收集一下花溪少数民族的歌谣和风俗，那是很有用的，你知道花溪为什么叫花坨坨吗？……1996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前，去遵义二弟爱初家看望病中的父亲(父母亲年老后由我二弟家和三弟家照顾)，那时他还是不忘叮嘱我，到了北京，要多了解北京的风俗人情啊。我一直没有把父亲的这些话真正放在心上，我好浅薄啊！

父亲自小在家读了不少家藏的古书典籍，后来在北京又进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中外书籍，他记性特别好，又不读死书，博闻强记，勤于思考。记得他经常在我们面前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说古道今，当时我曾惊异他古

文怎么背得那样熟，知道的东西怎么那样多，同时也还有点嫌他啰嗦。我后悔极了，当时为什么常常不知道珍惜他与我们的交谈呢？

父亲热爱家乡，热爱家乡的父老乡亲。我曾天真地问过他，你为什么不写东西了呢？你要是写，会成大文豪的。父亲觉得我的问题可笑，他说，那样的话，我会在务川干这么多年农村工作吗？我会知道这么多东西吗？做哪样都没有在务川这几十年好。谈起务川，他就容光焕发，他就精神抖擞。同样地，老家在贵阳的我的母亲，也热爱务川，挚爱她所教的学生。她在务川一中既教生物，又教英语，还上音乐课；既是教导主任、校长，又是“校医”、“学生管理员”，但她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心甘情愿。她生病在贵阳治疗期间，坚持要回务川一趟，她和父亲回了一趟务川，这就是她与务川的最后一别了……母亲逝世后，她的学生、作家司马赤在1991年1月6日《贵州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她的文章《夏花秋叶》，说“‘生时如夏花之绚烂，死时如秋叶之静美’，一代文豪泰戈尔的名句就是您——熊妈妈的墓志铭。”父亲逝世后，务川县委、县政府在登载这个消息时，称他“为务川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极大的贡献。他毫不利己，勤政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令人十分敬仰。”但好长时间，我竟然没有理解到父亲和母亲对家乡的这种崇高的爱，我为什么不早点向他们说“我也和你们一样”呢？

父亲偶尔也向我们谈到他的一些文章或文章的内容，但那是在教育我们时。除此而外，他对自己几十年前的文学成就是很少谈及的，尤其是对外人。母亲在父亲谈文章或文章内容时，总是含笑听着。母亲的微笑，证



20世纪80年代寿生全家照

明了父亲确有自己的作为……因为我们相信母亲。我知道母亲的心。她是父亲才华和文章的见证人，是父亲的知音。父亲当年在北京时，因为家道中落，兄长们后来很少给他汇钱了。他就打仗用在北京读书的朋友和他们的姐姐的钱（就是我的五舅、七舅、九舅和妈妈），是他们见证了当时父亲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书生崭露锋芒于北京文坛的。母亲多么希望父亲继续写作，但她又体谅父亲，理解父亲，她曾经对我说过，随他的便吧，他想写就写，没有时间写就不写。母亲的心是矛盾的。父亲的心就不矛盾吗？不过因为有母亲的慰藉，有母亲的呵护，他也就心平如镜了。可是，作为子女，我们在父母健在时，却没有想到要去北京证实一下，当时父亲到底写了些什么文章，如果能找到一些那时发表的文章，这对父母是一种慰藉，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

父亲和母亲一样很爱儿女，记得我18岁后考上大学那年，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赋诗道：“将养提携十九年，桂花佐酒学程新。添衣减裳儿自理，千里牵连父母心。”当时我读后，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我上大学时，他每次来贵阳开会，都要约我到他住地会面，与我上一趟馆子。一次他参加省政协会议，约我到他下榻的金桥饭店会面，那一次他的来信相约其实就是诗柬：“绕膝无多语，离开挂心尖。驰书朝阳子，金桥候老亲。”他称我为朝阳子，因为贵州大学坐落于花溪朝阳村。那一次，我约了和我同班的女朋友（后来我的妻子）一起兴冲冲地与他下了一趟馆子。但是，1996年父亲去世时我却没能守在他老人家身旁，这是我的终生憾事。世界上的事情有时是那样凑巧，那一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却作了一件多少可以弥补一点这一终生遗憾的事情。我大学时的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扬忠热情地帮助我，收集复印了可以找得到的寿生发表过的文章和小说很多篇，终于让人们能够一览寿生当年的文学成就和风华意气了。父亲和母亲虽然并不在乎人们对此是否知晓，但作为儿女，我们多么希望从前那些隐隐约约的感觉，是千真万确存在的。

8
解放后，父亲在家乡当了副的“父母官”，几十年来下乡、蹲点、抓“中心”，指挥架桥、修公路、抢收、抢种、救灾……工作很忙，干得很愉快，干得很充实。他也忙里抽空断断续续地写过剧本，为自己的小说设计了框架，还写了不少诗歌。这些，我多少有过耳闻目睹，我听他摆谈过，也看见过他写的有时娟秀清楚，有时狂草难认的手稿，一迭迭，一本本……我还记得他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写的一首诗《看“三打白骨精”》：“花言巧语一时妍，到底难逃丑象陈。三灾炼就识妖眼，百折不回卫道心。沙僧老实肩头软，八戒无知宠嘴（猪嘴）馋。可怜大好紧箍咒，付与脓包祸善人。”对女妖精和唐僧师徒作了各自的评价，现在读来也很有意思。可惜，这些手稿文革中被付之一炬了。我曾经责备过自己，为什么不以自己当时红卫兵的身份，把这些文稿保管在自己的身边呢？总不至于有人来抄我这个学生的箱子

吧……我太不知道珍惜了。

很感激的是,父亲几十年前在北京发表的那些文章,务川县政协于2000年12月以“务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出了《寿生文集》。现在出版的这个集子,增加了一些有关的资料和照片。在整理文集资料和照片的过程中,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我懂得了什么是珍惜。

2006年4月于南明河畔

作者为省政协科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原贵州教育学院党委书记。

寿生：不应被遗忘的贵州作家

(原务川文史资料《寿生文集序》)

何光渝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9月11日,胡适在写给文学青年企霞(即后来成为作家、1957年“反右”时与丁玲同被打成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陈企霞)的一封信中,在批评了他“写的文字不曾经过‘说老实话,说平常话’的训练”之后,特意写了这样一段话:

《独立》(笔者注:指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向不登文学作品,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送上《乡音》、《新秀才》两篇,可以代表我们要的文字,《新秀才》一篇是一个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做的。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类的文字。但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至少我的偏见如此看。(《胡适文集》第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胡适所说的那个贵州学生,是申尚贤,笔名“寿生”。

《独立评论》是胡适创办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5月的一份政治新闻评论周刊,由一小群自由知识分子、“八九个朋友”民办。胡适在创刊号中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我们要求读者的也正是要求我们自己的:……批评与讨论应是心平气和的并且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的。”(胡适:《独立评论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当时为该刊撰稿的多为有一定声望的学者文人。千家驹后来在他的散文《我的朋友胡适之》中回忆道:“胡先生在北平办《独立评论》时,他向我约稿,……当时在《独立评论》上撰稿多为名流学者。如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颇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名家经典记怀散文选》,向弓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可见这份刊物在当时文化中的地位 and 影响。

而来自贵州,没能够考上北京大学、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申尚贤,自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1月21日,以“寿生”为笔名,在《独立评论》第86